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Lacan and Post-Marxism

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严泽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Lacan and Post-Marxism

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严泽胜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严泽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958-7

I. ①拉… II. ①严… III. ①拉康, M.L. (1901~1981)—哲学思想—研究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565.59②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023 号

拉康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LAKANG YU HOU MAKESI ZHUYI SICHAO

严泽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958-7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 25 年时间。然而,这 25 年时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对于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和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是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

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时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上“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等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我国学术界所理解；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准备性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

^①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①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③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回顾我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立足于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来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②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③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认识和评价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以此为裁判权，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其一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否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的确和恩格斯、列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有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但是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这其中既有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显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其二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经很深刻。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问题研究、人物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事实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群体在不断缩小,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重要研究方向。自 1981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以来,就一直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研究方向。2006 年我们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博士,形成了学术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并把研究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为主体,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学科点,被纳入学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这套丛书就是我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术团队部分教师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或者他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目 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王雨辰 /1

引 言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幽灵:主体建构与历史乌托邦 /10

一、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 /12

二、意识形态与历史乌托邦 /18

第二章 重构领导权:激进民主与后乌托邦政治想象 /29

一、作为真实域的政治 /30

二、从“主体位置”到“欠缺的主体” /35

三、领导权与缝合的逻辑 /49

第三章 穿越幻象:精神分析式的意识形态批判 /66

一、差异的辩证法 /67

二、质询“真实” /70

三、幻象的逻辑 /75

四、穿越意识形态幻象 /83

第四章 后现代精神分析的欲望政治学 /92

一、欲望机器与精神分裂分析 /93

二、漂流的欲望哲学 /102

第五章 超越菲勒斯:性别政治与反抗的新形式 /112

一、作为政治革命因素的“女性写作” /117

二、性差异对同一性逻辑的颠覆 /122

三、符号域的革命 /129

四、性别表演的政治学 /134

第六章 走向“反哲学”的真理政治学 /145

一、存在与事件 /149

二、主体与真理 /160

附 录 /167

一、拉康与分裂的主体 /167

二、科耶夫:欲望和历史的辩证法 /178

三、无神的神学:巴塔耶的“反神学”思想 /189

参考文献 /208

引 言

一般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这根“枝干”上,不断地嫁接不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话语“枝叶”,以形成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例如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晚近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某种特定话语嫁接的产物,这种话语就是20世纪60—70年代巴黎理论大爆炸所产生的后结构主义。作为现已被誉为“后马克思主义宣言”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的作者,拉克劳和墨菲在多次访谈中表明过,他们建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工作的最重要方面,是“尝试着把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理论洞见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和政治实践中”(墨菲语),因为“后结构主义传统有助于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理论宝库”(拉克劳语)。可以说,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工具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进行重新阐发的产物;没有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后马克思主义当然无所依凭,而如果没有后结构主义,领导权概念仍可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只是那样的话,它就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了”(拉克劳语)。如此看来,界定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是后结构主义而不是葛兰西。因此,在2000年拉克劳与另外两位当今十分活跃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和巴特勒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一书中,《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被指认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向”,^①正是这一转向,

^①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界定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差异中的同一性”特征。

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是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社会后现代转型期的历史状况(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福利国家、跨国资本主义)、现实政治运动(“五月”风暴、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各种革命性的理论(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加上法国式的浪漫激情等多重因素共同催生的众声喧哗的反叛思想运动。后结构主义质疑传统形而上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观念和原则,以解构的方式对之进行瓦解颠覆,引发了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理论的地震式的大变局。在这场思想运动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当属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拉康的学术活动跨越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两代知识分子,既上承战前的超现实主义、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巴塔耶的无神论的神秘主义等后现代史前思想,又下启了战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博德里亚、伊利加雷、克里斯蒂娃等整整一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拉康是战后推动法国思想潮流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对主体性、语言等问题的深刻洞见,他提出的想象、象征、真实、漂浮的能指、滑移的所指、缝合、对象 a、无意识的主体、幻象等范畴,无疑已成为刺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理论话语创新图变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域,最先认识到拉康理论之重要性的是阿尔都塞。1963 年,当拉康在正统精神分析学界的逼迫下几近走投无路之时,是阿尔都塞力邀拉康到他所执教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开设研讨班讲演,为拉康思想向精神分析学界以外的领域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64 年,阿尔都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称赞拉康的著名文章《弗洛伊德与拉康》,他在文章中声称,拉康试图不参照统一的自我的概念重新思考精神分析学的做法,为他自己试图不参照黑格尔的绝对主体而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援。在发表于 1969 年的名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报告中,阿尔都塞直接将拉康的主体性理论运用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影响极其深远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正是通过阿尔都塞,拉康理论被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域,成为引发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的重要动因。英国学者西姆说:“阿尔都塞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的计划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反而为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开辟了一些非常有希

望的探究路线。”^①从当今主要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拉克劳、墨菲、巴迪欧等要么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要么在学术起步阶段深受阿尔都塞理论的影响这一事实，不难看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拉康主义”的理论渊源。

后马克思主义是“‘后一’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②。按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它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这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或者说在其理论运作中仍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同时它也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逻辑、范畴的超越，“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③。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已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状况，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使传统的阶级结构变得模糊不清，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使得经济上的阶级压迫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压迫形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的阶级斗争不断弱化乃至消失了，而其他新的社会斗争形式却层出不穷地出现，“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④。拉克劳和墨菲声称，当代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构成了挑战。新的社会斗争形式表明，社会结构已由二元化的阶级对立转变为多元化的主体立场间的对抗，而主体立场（身份）不再仅仅归结为经济地位决定的阶

① 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 同上书，第1页。

级立场(身份),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多元认同问题。主体立场的多元化使得新社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多层次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如果仅以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作为普遍统一的主体身份不过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虚构)的解放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目标,势必会无视甚至压制其他超阶级的反抗压迫、寻求承认的政治诉求。

因此,如果说后现代世界的显著特征是作为普遍革命主体的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从而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丧失了主体性基础,其有关解放的宏大叙事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那么,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力图重构政治主体,以便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为解放政治提供新的动力。后马克思主义拒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观,在他们看来,主体身份不是由某种本质因素决定的,而是认同建构的产物。在这一点上,拉康的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拉康那里,人类主体不是具有确定本质的存在,而是存在的欠缺,此欠缺即为欲望,主体即为欲望的主体。因此,主体不再被当成既定给予的、静止完成的状态,而是一个变动过程或运动。作为存在的欠缺,主体因而总是一种“要存在”(want to be),即总是欲求实现自己,通过各种认同获取稳定的身份。不过,既然主体自身是欠缺,是空无,他注定不能达到与自身的完满认同,获得自我同一的身份。他寻求认同的对象只能是他者,不管是想象域作为理想形象的小他者,还是象征域作为主导能指的大他者。这样,他在认同中体验到的永远是异化或错位,一种自我同一之不可能性的挫折感。主体的身份永远只能是异化的、外在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多重的。正是这种非本质主义的主体观,使后马克思主义得以认识到,社会行动主体不可能具有某种认同之外的本质因素决定的普遍身份,而只具有在无限分延的认同过程中暂时获得的身份。既然主体的身份是流动易变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任何身份共同体都是不稳定的,多元分化的。所以,对主体来说,任何普遍、稳定的本质身份都是一种束缚,对既有身份的超越并寻求新的认同,恰恰是主体解放叙事的一部分。

由此观之,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身份,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话语集合,涵摄那些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语境中、

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恢复生机活力的话语实践。本书不是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全面评述,而是以拉康理论为线索,对其在当代左翼思想中所激发的理论想象予以梳理分析,以期一方面能展示拉康精神分析学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效力,另一方面则能勘测出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语境中所能达至的深度和广度。

阿尔都塞和深受其影响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较早将拉康理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并促使其转型的关键人物。阿尔都塞根据拉康的“想象”概念,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对个体与其真实的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表征,从根本上取消了曾长期困扰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真”、“伪”意识问题,使意识形态的性质得到了全新的解释;同时,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做社会再生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形象性媒介,他尤其强调主体是个体通过意识形态“质询”而被建构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阶级主体的本质主义身份观念。詹姆逊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定义,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遏制策略”,它体现为压制来源于历史和必然的现实矛盾并使之得到想象性解决的叙事形式。历史在詹姆逊看来就是拉康的真实,它是总体性的不可再现的“缺场的原因”。不过,詹姆逊不同意阿尔都塞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加以严格对立,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仅是遏制策略,它也是一种乌托邦,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既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分析)也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冲动),因为批判性的阐释和乌托邦的投射,实际上是同一个辩证过程的不同侧面,意识形态“除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它指向的是历史乌托邦。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理论界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是由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明确宣称(尽管他们不是此概念的最早使用者)和理论话语实践而确立其意涵的,并由此成为审视当代左翼思想的一个有效的理论视角。在他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尝试从当代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那些丧失了现实有效性的范畴进行批判性重构,以使它们在新的现实语境中恢复活力,适应新的社会斗争的需要。拉克劳和墨菲致力于激进民主的政治规划,他们的基本策略是以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为工具,重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概念,以此建立一种符合自由、多元的激进民主的社会组织原则。领导权

的逻辑是拉康意义上的缝合逻辑,具有“非本质主义的中心化”特征,它既杜绝任何导致本质主义—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又避免陷入放任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保持领导权连接的偶然性和开放性,是民主革命得以深化的唯一有效途径。

齐泽克于1989年出版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可以说是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理论呼应。齐泽克将其理论视角聚焦于意识形态批判,通过对拉康后期理论的精深解读,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性质作出了全新的阐明。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在于他未能说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询唤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自身是如何“内在化”的,它是如何制造出对事业的意识形态信仰这种结果的,又是如何制造出主体化、对某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认知这种互相关联的结果的?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是通过作为欲望的对象—原因的“对象a”完成的,意识形态对主体来说是填补或掩饰“对象a”在现实中造成的空缺的幻象,它是现实的支撑物,赋予现实某种一致性。换言之,意识形态就是建构现实的幻象,因此,精神分析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目标,就是穿越体现于物质性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幻象,坦然面对它所掩饰的真实之深渊。

后现代精神分析的欲望政治学是1968年的革命催生的产物,它是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狂欢式交融,其成果主要有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利奥塔的《利比多经济》等。拉康精神分析学构成了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家话语实践的出发点,但这一出发点却也是挑战的起点。如果说在拉康那里,人的主体被去中心化为分裂的主体,那么他们则试图将主体去主体化,使之还原为“无器官体”或“利比多带”。作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亲历者,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家试图重新思考欲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期望能够开拓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视欲望为革命性的力量,但此欲望不是拉康式的作为欠缺的欲望,而是尼采式的作为原始生命力量的生产性欲望。这样,欲望不是存在于拉康的想象域和象征域,而是存在于真实域,存在于真实的身体中。真实的身体在德勒兹和加塔里那里被称为“欲望机器”或“无器官体”,在利奥塔那里被称为“利比多带”,它摆脱了能指的束缚,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革命性的欲望能量。

对他们来说,欲望就是它自身,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它像精神分裂之流一样四散逃逸,冲破、摧毁任何束缚它的规则秩序,因此,“是欲望,而不是左派的节日”构成了真正的革命性力量。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当代左翼文化批判理论的一支重要力量,它起源于拉康的三个女弟子西苏、依利加雷和克里斯蒂娃运用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对性身份、性差异以及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父权制象征秩序的颠覆批判等问题所做的卓有创见的研究工作,而近年来美国的“酷儿理论”家朱迪·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则代表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拉康既有接受也有批判,她们一方面赞同拉康对传统人道主义的中心化主体的批判、对语言优先性的强调等,另一方面则毫不留情地批判拉康理论所隐含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她们之间的观点亦存在很大的差异,西苏和依利加雷将女性特质定位于女性生理性的身体中,持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差异观;克里斯蒂娃则将女性特质定位于无论男女的身体中源于母体的前象征、前语言的“符号域”,因而主张并不存在“本质化”的性差异;巴特勒就更进一步,声称性差异(无论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是“表演”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试图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的策略的变化。西苏和依利加雷试图建立一种与女性身体和性欲同构的多形、弥散、非中心的女性语言,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义单一、逻辑连贯的男性语言。克里斯蒂娃拒绝本质主义的性差异观念,她把女性特质的诗性语言看做是源于前俄狄浦斯期的符号域,这对于男性女性都是同等可获得的,因此,运用女性特质的诗性语言去颠覆限定主体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的父权制象征秩序,乃是那些遭受压制的男女主体的共同事业。巴特勒否认任何生理特征与性别身份的关联,她认为性别乃至身体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因而完全可以以颠覆现存规范的方式来重新建构主体的性别身份;巴特勒采用的策略是表演性的“引用”,即通过引用父权制的异性恋性别规范而从其内部瓦解、颠覆它。

阿兰·巴迪欧是经历过1968年的政治和理论风暴洗礼而成长起来的“法国新哲学”家之一。他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受其影响而成为毛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狂热信徒。如果说毛主义赋予他激进的政治立场,那么